

# 夏辇生“韩流三部曲”中的韩国英雄形象

藤田梨那\*

## 序，90年代韩人题材小说所提示的新课题

- 一， 《船月》的叙述空间与主题
- 二， 作者与韩国的深层因缘
- 三， 韩国英雄形象刻画
- 四， 韩流三部曲中的跨文化书写
- 五， 韩流三部曲的当今意义

## 序，90年代韩人题材小说所提示的新课题

进入90年代，中国与韩半岛之间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实现了南北韩与中国的对等交流。中国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也为建交后的中韩交流全面打开了快车道。两国学者的交流、经济贸易的交流、中韩企业的提携、旅游事业等，都呈现了快速、广大、火热的发展局面。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家们开始对韩国的文化、历史发生兴趣，透过目前中韩的多方面交流，把审视的目光转向两国之间尘封已久的历史，试图从中摸索到两国之间更深远的因缘脉搏。在文学创作上陆续有一些韩国题材的作品出现，如：理由的《浪迹萍踪》、肖凤的《韩国之旅》、许道明的《木槿花的传说》、孔庆东的《独立韩秋》等一些散文作品。但在90年代末最令人醒目的作品可谓夏辇生的韩人题材三部作品——《船月》《虎步流亡》《回归天堂》。

《船月》<sup>1)</sup>是一部描写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结缘中国船娘的历史小说；《虎步流亡》<sup>2)</sup>是记述作者自己家族的特殊经历、作者与韩国人士的交流，交错记述抗战期间金九避难嘉兴的流亡生活的纪实文学作品；《回归天堂》<sup>3)</sup>也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记述上海“虹口炸案”的韩国义士尹奉吉的故事。与其他作家的作品不同的是夏辇生的韩人题材作品明显地以一个历史主题为贯穿线，将十年的实地调查结果立体地穿插到作品中，每一部作品都是有机的、整体性的文学叙述。因为三部作品均以韩国民族英雄为描写对象，故又有“韩流三部曲”之称。

通观五四以来的韩人题材的文学作品，单以南韩即韩国作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可谓皆无，当然从五四到建国这一段时期，韩半岛还未被南北分断，中国作家多以一个整体来看韩半岛。建国以后特别是朝鲜战争以来，中国作家的视线一直集中在北韩——朝鲜。<sup>4)</sup>从政治方面来说，直到80年代为止，韩国一直都是一个被

冷漠的对象，因此建国以后涉及韩半岛的文学作品也就多限制在朝鲜。夏辇生的韩人题材作品是以中韩建交与中韩交流的热浪为背景的第一次对韩国的正面叙述，故夏辇生荣有中国文坛以韩国抗日复国斗争为题材进行长篇创作的第一人之称。目前夏辇生的韩人题材作品已引起国际文坛的关注，《船月》韩语版在韩国受到了众多读者的欢迎，被誉为“一个中国作家填补了韩国文坛的空白”，还荣获了韩国政府奖。同时受到国际文坛的重视，被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英国的剑桥大学等收藏，列入重点书目。

在90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大陆文学已呈现出作品的商品化、一次性消费化的时代现象。在这样的浪潮中出现的夏辇生的“韩流三曲”具有如何的文学意义和历史意义？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对韩认识是怎样的？叙述手法与以前的韩人题材作品有什么不同？在当今文化交流全球化的形势下，夏辇生的“韩流三部曲”中的史实叙述与“他者”形象描述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这些都是有待我们去认真讨论的问题。本论文准备从历史的真实性与叙述的真实性的相关角度解读夏辇生的韩人题材三部作品，探讨以上所提的诸问题。本论文所用“他者”之意并不涉及心理学的概念，仅用于文化交流全球化中的异域文化。

## 一、《船月》的叙述空间与主题

《船月》拢括的是30年代到40年代这一段历史。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自1919年韩国三一独立运动时逃亡到中国，在上海参与了韩国临时政府的组建，并担任了警务局长的重要职务。1932年1月他策划了由李奉昌执行的暗杀日本天皇的东京事件。4月又策划了由尹奉吉执行的上海虹口公园炸案，事后为了保护一般市民和侨民，金九发表了正式声明，表明事件是由他亲自指示的。于是日本军开始疯狂地搜捕金九，金九由上海转移到嘉兴避难。《船月》描写了金九在嘉兴避难的一段生活。《船月》以「引子」开首，接下来是10个章篇，结尾是「尾声」和「作者补述」，最后加上「后记」。每一章的开头引一段《漂在水上的日记》，以此作为一章的伏线和概括。《船月》的主题是什么？笔者认为这部作品的主题就是一个“缘”——金九与朱爱宝的“缘”、金九与中国民众的“缘”。

作者在「后记」中坦诚地道出了她的作品世界，她说：“恐怕，正是因为这种没有退路的逼进，我以全身心的投入走进了历史，走进了故事，走进了那一个个活生生的因缘聚散的生活，走进了一个无限惨烈而又无限壮美的悲剧·····”几行文字便表明了作者是意识地走入她所面对的历史的。E·H·卡(Edward Hallett Carr)对历史小说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历史，是在人们将时间的流动不是做为自然的过程——四季的循环或人的一生去看待，而是做为特种的事件——人们意识地卷入进去，或能够主体性地予以各种影响的事件——的连锁来考虑时才开始的。”<sup>5)</sup> 夏辇生进入的是30年代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

那段活生生的“因缘聚散”的历史。「引子」中说：“世界上有一个不识字的女人，把她生命中最珍贵的一段经历，写成了日记。”<sup>6)</sup>这是女主人公朱爱宝用船槽写在水中的日记。《漂在水中的日记》是一个象征，即意味着不被记录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不能用眼去看，而只能用心去看，用意识去摸索。作者在「作者补述」中对「引子」作了解答。「作者补述」中极简捷地概述了促使《船月》产生的人与事的机缘，作者说：“由于特殊的因缘，我作为一名记者，自始至终参与了对这段尘封往事的寻踪。”“偶尔有一天，我在三塔湾月光如银的水面上，读到了一个船娘漂在水上的日记，于是，就打捞起这么一个深埋在已逝岁月中的故事。”<sup>7)</sup>「引子」「作者补述」「后记」已点明了《船月》的世界与主题，就是描写朱爱宝与金九的因缘故事，及围绕着他们的种种因缘聚散。而把这些因缘故事打捞起来的作者，又与这种种因缘有着“无法拒绝的缘分”。

有关朱爱宝与金九结情故事的史料来自金九的自传《白凡逸志》。<sup>8)</sup>但我们翻开《白凡逸志》便可以发现那里对朱爱宝的记述是很零散、很简捷的。朱爱宝的名字在「下篇」中出现了5次，其中前4次都是极平淡的记述，只有最后一处的叙述内容稍多，同时也夹杂了金九的一些感情。金九写道：

离开南京时，我把朱爱宝遣返回她老家嘉兴去了。深感后悔的是，那时只给了她一百元旅费。她只知道我是广东人，服待我将近五年的时间，我和她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类似夫妇的感情。她照顾我实在功劳不小。当时，我认为一定会后会有期，所以除了车资外，没有给她足够的钱，真是遗憾之至。<sup>9)</sup>

从这段记述中，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朱爱宝与金九相处的时间，两人之间已产生近乎夫妇的感情。但朱爱宝是怎样的女人？他们的感情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朱爱宝为金九作了些什么？这些疑问都不能从《白凡逸志》中得到解答。但尽管如次，《船月》的作者确实捉住了想像的线索。在《虎步流亡》中作者记述了她寻找朱爱宝的过程与结果。在嘉兴，与金九有过接触的人物，如褚辅成的后代陈国琛、孙永宝的儿子孙桂荣等，都是经过作者努力的探寻被找到的。但朱爱宝的消息却仍然是不甚明了的，只知道她早已去世。但作者这时已下决心要将这埋在史实与史实之间的历史打捞起来。她说：“朱爱宝手下那把大橹一下一下深划在我的心上。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用心去聆听历史的回声，把这个普通但却伟大的女性写在我的故事里。”<sup>10)</sup>作者捉住的有关朱爱宝的线索是“类似夫妇的关系”与“船娘”。船娘、漂泊的船、船娘手中的橹、河水，再加上超越感情、俯瞰一切的月，这便构成了作者的想像空间。朱爱宝与金九的结缘故事是在作者的虚构中完成的，但这个虚构又正是作品呈现的“叙述的真实”。作者所完成的是将史实的真实与叙述的真实揉和在一起的困难的工作。《白凡逸志》中有关朱爱宝的记述可以说是一个史实，但因为记述得过少，我们无法了解实际上她与金九

的生活；而且除了《白凡逸志》，再没有其他历史书（正史）记述朱爱宝这样一个太普通的女人了。从这一层来说，《白凡逸志》中有关朱爱宝的记述可谓一个“轶事”。金九笔下的几行文字，一方面确实点出了朱爱宝“忍辱负重而无怨无悔”的品格，使人难以忘怀。另一方面在他对朱爱宝的感激中也凸现了他做为一个普通的人的情感。用《亚历山大王传》作者谱鲁塔克的说法，这就是金九的“心灵的表现”。<sup>11)</sup>《船月》的切入点就是这个“轶事”和“心灵的表现”。作者从这个切入点进入想像与虚构的世界，选择史料中的史实，配合上用十年的时间调查出来的史实、历史人物，发挥作者精练的笔力，拓展了金九在嘉兴度过的那段避难生活，描绘出了朱爱宝与金九悲壮而美丽的结缘故事，使人感到它跟史实一样真实。

朱爱宝的人物设定是嘉兴的一个船娘，朴实纯厚，不识字，但却很相信命运。第一章开首的《漂在水上的日记》中，朱爱宝告白了自己心里一直惦记着的一件事：小时候算命鸟为她叨出来的一张印有船与月的纸牌，和算命小神仙说的“小姑娘有萍水相逢之命”那句话。“萍水相逢”就是一种缘分，预告着朱爱宝将直面于一个甘苦交加，波澜悲壮的因缘聚散的命运。

朱爱宝与金九初逢是在1932年的初夏，这个时间设定很重要。这一年的4月29日，韩国义士尹奉吉按照金九的指示，在上海虹口公园趁日军举行“天长节”万人祝捷大会，向会场投了炸弹，当场炸死日军总司令白川大将。“上海虹口炸案”发生后，日军以60万大洋悬赏通缉捉拿金九。金九自传《白凡逸志》的下篇中，尹奉吉的“上海虹口炸案”和李奉昌的“东京炸案”是重要的两次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行动，对这两个事件金九都作了详细的记述。“上海虹口炸案”后，金九紧急避难到嘉兴。在嘉兴偶然与朱爱宝相遇，在朱爱宝的掩护下见到了帮助他避难的褚辅成。可见作者的时间设定是为了将朱爱宝与金九的因缘故事安排在韩国志士勇敢抗日的背景之中的。

作者夏羣生为了重述朱爱宝与金九那一段生活，选择了一系列与他们有关的史实，首先将时间的开首设在1932年初夏，将尹奉吉的“上海虹口公园炸案”定为第一个史实，为作品布下了确实的历史背景。作品中主要描写朱爱宝与金九的结缘故事，但除了他们以外还立体地安排了诸多的人物、诸多的因缘。如：金九与褚辅成一家人的真挚的交往；金九与孙桂荣；金九与陈国琛；金九与黑胡子等，金九在嘉兴与许多普通的民众打过交道。朴实忠厚的嘉兴民众热情地接纳了他，有些人为了保护他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又如哑巴子，他一直挚爱着朱爱宝，但一旦知道朱爱宝爱着金九，他便用生命来保护朱爱宝和金九，最后为了掩护金九，被日寇打死。作品的各个章节中都可以看到“缘”这个字眼，这个缘不只是指朱爱宝与金九的缘，有很多指金九与嘉兴民众的血浓于水的情分。这些因缘故事有的取自《白凡逸志》，有的选自作者的调查，有的来源于作者的想像。作者将他们立体地组合起来，构成一个整体的、活生生的历史空间，在这个历史

空间中，朱爱宝与金九的结缘故事由浅入深，浸着众多人的生命，浸着中韩人民的血与泪、理想与绝望、欢乐与痛苦，以一个整体性的历史故事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这部作品的叙述的真实就是这样完成的。

## 二、作者与韩国的深层因缘

《船月》与《虎步流亡》是关联极紧密的两部作品，写作时间在1998年末至1999年初，基本上是一气呵成的。长篇历史小说《船月》中的许多史实均根据《虎步流亡》中的实地调查的结果；《船月》描写金九与中国船娘的深厚而悲壮的情缘；《虎步流亡》则塑造出独立运动领袖金九的形象。

夏羣生对《虎步流亡》的叙述定位是：三通道时空交错。三个通道是：一，有关金九流亡中领导抗日复国斗争的历史故事；二，金九的儿子金信在半个世纪后来嘉兴寻访旧踪的纪实性事件；三，作者因“韩国缘”而在文革期间经历的家庭遭遇。即《虎步流亡》包容了三个历史层面，一个是金九流亡中国的那一段历史；一个是风云动乱的文革时代；一个是90年代中韩建交前后的时代。金九流亡中国的旧踪调查始于金信的来访，而金信的来访得以实现则在于时代的变化。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韩国是一个在政治上被否认和回避的对象，很多中国人知道北朝鲜却不知道韩国。但进入80年代，大陆的改革开放促进了大陆与海外各国的交流，中韩之间开始了民间范围的经济交流。到了90年代，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为两国的各项交流敞开了大门。这样的时代变化为金九旧踪的调查提供了可能性。

我们在《船月》的「作者补述」和「后记」中已大略知道金九流亡中国的那一段历史的挖掘源于金九的儿子金信的多次寻访。读了《虎步流亡》，才了解了金信寻访的全部过程。夏羣生本来是《嘉兴日报》的记者，因为她的姐夫是韩国人，她受姐夫之托，接待并陪同金信寻访金九旧踪，通过十年的寻访，终于把金九流亡的史实从尘封已久的历史中挖掘出来。

有关金九流亡中国的历史的线索是很稀少的，只靠《白凡逸志》和金信的一些断片性的记忆，调查中困难是很大的。但夏羣生不折不挠，发挥她做为记者的敏感与坚韧，终于找到了《白凡逸志》中记述的有关金九在嘉兴避难的具体地点，如：金九主要避难地点梅湾街76号，陈桐生的家；褚辅成的宅院；海盐的载青别墅；还有韩国临时政府要员居住过的日晖桥17号石库门大院等。在人物方面的调查中，夏羣生找到了褚辅成的后代，陈国琛等，了解到有关褚辅成与金九的往事；发现了孙永宝的儿子孙桂荣，从孙桂荣的回忆中得知了金九从上海秘密运到嘉兴的一箱炸弹，和孙永宝一家为保护这箱炸弹尽力的一番周折。夏羣生的调查成果为证实和弥补金九流亡中国的历史作出了很大贡献，在20世纪中韩交流史中，《虎步流亡》所具有的史料性价值是不能否认的。

《船月》与《虎步流亡》虽然是不同形式的作品，但实际上是表里相衬的两部作品，《船月》以写朱爱宝与金九的结缘故事为主，描写出一个惨烈而壮美的悲剧。《虎步流亡》则以记述金九的避难生活为主，塑造了独立运动家金九的形象。其中很多地方记述了作者对各个历史事件的感触，因此，《虎步流亡》还可以说是《船月》的题材宝库，为我们理解作者的对韩认识、对韩感情，提供了重要的根据。也为我们探讨《船月》的描写与作者内心世界的关连提供了有意义的线索。

《船月》与《虎步流亡》有一个共同点，即对“缘分”的强调。当我们读《船月》时，就感觉到历史上众多人物的因缘的分量；当读到「后记」时，第一句话就是：“写完这部书稿以后，我恍然顿悟：世界上许多因缘天定的事情，往往是无法拒绝的。”接下去便是一连串“缘分”迎面袭来，从「后记」中我们知道作者的姐夫是韩国人，他的父亲与金九有过关系；我们又知道后来她姐夫一家回韩国去了；我们还知道作者受了姐夫的委托，帮助金九的儿子金信调查当年金九在嘉兴的生活，等等。作者把它们称为“不容拒绝的缘分”。然而，我们在「后记」里很难摸索到这些“不容拒绝的缘分”是怎样串联在一起的，在作者的内心世界发生了怎样的作用。我们要重新提问：作者的人生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件？她再三强调的缘分与她长达十年的调查，与“韩流三部曲”写作动机到底有什么内在的关系？

抱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打开《虎步流亡》，在开首部分又是作者向“缘分”提出的问话：

命运是什么？我常常会问。

问过了大半辈子，还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

我又问，什么叫缘分？似乎也没有谁能说得清楚。<sup>12)</sup>

《船月》的缘分只限在作品人物之间，但《虎步流亡》中的缘分却是作者自己的问题了。作者问了半辈子的问题始于文革的动荡期。文革初期，她的姐夫突然以“朝鲜特务”的嫌疑，受到逮捕的通缉令。她的父母因此也受到牵连，被戴上“特务”的帽子，关进“牛棚”。她的父亲在“牛棚”里受尽毒打，致使他完全绝望，在一天夜里用斧头自杀了。经抢救虽然未至丧命，但那以后成了卧床不起的身体。当时夏犇生被通知去洗被鲜血染透了的被子和床单，年轻的作者受到了莫大的精神打击，作者说那是一个“血的冲击”。在《虎步流亡》中，作者回忆了父亲自杀前说过的话：“唉，说不清楚了。什么都说不清楚了。”还沉痛地写道：“确实，他说不清楚。那是个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的疯狂时代，他说不清楚他女婿是不是特务，也说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特务。确切地讲，他连说的权利都没有。”<sup>13)</sup>文革结束时，作者的父亲和姐夫都被平反了，但她的父母已是身心创

伤累累，无法医治。而且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姐夫的“朝鲜特务”之谜依然留在他们的心里，难以解开。直到80年代中期，作者才知道姐夫的身世，但那时她的父亲已不在人世了。

《虎步流亡》的三个历史层次中，中间的一层即文革时代，就是作者经历的“血的冲击”的时代。在种种冲击中，她开始思考：姐夫是什么人？韩国是怎样的国家？中国和韩国究竟有过怎样的交往？对中国与韩国的缘分的提问，对自己与韩国的缘分的提问，对文革的反思，这些都促使她在90年代，以浑身的力量和热情投入于寻访金九旧踪的工作。我们可以说，促使她将90年代与金九流亡中国的30年代连接起来的原动力就来源于文革那段“血的冲击”的历史。她对金九的理解和感动也基于文革期间的种种体验。所以，不理解她的遭遇和痛苦，也就不能理解她的“韩流三部曲”的创作动机。“历史的回音，是需要用心去聆听的”，这是夏辇生的信条。能用心听，就必须先用心去问。文革时期的体验使她开始用心向历史提出疑问，用心去听历史的回答，听金九的回答。可以说，她对历史的磕问就是对韩国这个“他者”的划界与认同的过程。

我们从《虎步流亡》了解到了作者的经历，才明了了《船月》「后记」中她说的种种“不容拒绝的缘分”的意思。文革期间造成作者一家深受创伤的原因在于姐夫与韩国的关系。姐夫之所以在中国，是由于他父亲和叔叔跟随金九在中国从事独立运动。这本来是抗战时期中韩人民同命运共患难的，值得记忆的历史。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阵营上呈现出东西冷战的状态，朝鲜战争后，韩半岛被南北分断。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与韩国一直隔绝，中韩两国人民相濡以沫的历史被无情地封闭起来。在文革中，一提到“韩国”就会立刻唤起“间谍”“里通外国”“特务”等疑念。夏辇生在文革结束后仍然不能解开她的疑问。“「朝鲜特务」之谜，依然存留在我心底的疑惑中难以解开。”<sup>14)</sup>这句话告诉我们，她一直在向这个事件提出质疑，向历史提出质疑。她的疑问经过十年的寻访调查，终于得到了解答。如E·H·卡所说的那样，她“意识地卷入了历史，并主体性地为历史起了作用”。

在《虎步流亡》中，作者面对自己打捞起来的历史，意味深长地感慨道：“在今天回忆这些往事时，许多人都已不在人世了。但是，每当打开这段尘封的历史，这些人却都活生生地‘活’在眼前。一方面是一批前仆后继、以身许国的韩国仁人志士；另一方面是一些平凡善良和默默无闻的普通中国人民。他们偶尔相遇，相识，进而相互理解以至相濡以沫。这不能说，这跟我们的国土相依相接没有关系！就象在韩文中至今还有许多汉字一样，有着它必然的因缘和源头。”<sup>15)</sup>因为夏辇生意识地卷入了历史，那些被人忘却的历史便活生生地在她眼前展现开来，历史中的种种因缘也都有机地串联在一起。因缘由人与人的范围扩展到国与国，文化与文化的范围。《船月》中的世界不正是这样的吗?! 金九、李奉昌、尹奉吉都是不怕死的仁人志士；哑巴子、孙桂荣、朱爱宝又都是平凡善

良的中国人，他们能理解志士仁人的胸怀，愿意“好人帮好人”，甚至为了保护他们付出自己的生命。鹧鸪与红爪鸟、杜鹃花与无穷花，又是用了象征的手法表现国家之间、文化之间、民族之间的因缘关系。

### 三，韩国英雄形象刻画

#### (一)，船娘朱爱宝眼中的金九形象

《船月》中金九的形象是通过嘉兴人民的角度来描写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船娘朱爱宝对金九的感情上的变化。开始金九以一个语言生硬的“广东人”、“黝黑而粗糙的麻脸”的客人出现在朱爱宝面前，这显然表明金九是与嘉兴人不同的“他者”存在，而朱爱宝对金九的感情上的变化又表示了对“他者”的理解、认同。

朱爱宝对金九的感情是在她掩护金九的艰难岁月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褚辅成儿媳难产时，金九作出的诚心诚意的帮助；在河中遇到大风浪时，金九对朱爱宝的关怀；在朱爱宝的船上日夜工作的金九；金九的那双明亮的眼睛……，这些都沁润着朱爱宝的心，一个坚强的抗日英雄，一个“心最好，最懂得爱别人而又最值得别人去爱的男人”——金九的形象逐渐充实了朱爱宝的心。

朱爱宝是不识字的女人，金九便教她识字。一次他把尹奉吉和李奉昌的名字教给朱爱宝，告诉她“别小看这么一个字，那可是一颗赤诚的心啊！”“是一颗为国家，为民族，无私无畏彻底奉献的心！”<sup>16)</sup>在金九的教导下，朱爱宝认识了“奉”这个字，理解了这个字的分量。而促使她在感情上接近金九的也是尹奉吉、李奉昌的英勇行动。《船月》第四章中有一段描写金九得知李奉昌在日本被枪决的消息时的悲痛情景。他悲痛涕下，为了悼念义士绝食了一天，并立刻疾书《屠倭实记》。对此朱爱宝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今天的情景，着实把她吓坏了。长这么大，她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动容悲泣的男人。何况，是一条硬汉子！特别是，那泪闪着逼人的寒光，如此平静地淌在一张钢浇铁铸般坚挺的脸上。<sup>17)</sup>

经过几次惊心动魄的事件，朱爱宝逐渐受到金九的感化，理解了李、尹二义士的赤诚之心，在她的心里，李、尹二人和金九都是好人，“好人帮好人，是天经地义的事。”<sup>18)</sup>她在金九祭奠李奉昌的地方植上了一簇杜鹃花，又在金九的鞋底上纳出了一朵“红灿灿的杜鹃花”。这些都表明着朱爱宝与金九已有了共同的感情。杜鹃花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朱爱宝对金九的爱情，也象征着爱国义士的赤诚的血与心。在这里，朱爱宝与金九初逢的时间设定的意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朱爱宝开始接触到金九的心灵世界，对金九奉献之心的理解与感动坚固了她对金九的信赖。朱爱宝走近金九，嘉兴民众保护金九，这正是作者为《船月》设下的“他者”认同的构思，作者将这个构思用“缘”来具现出来。

第6章以后“缘”“缘份”这样的字眼频繁出现。第7章中金九与朱爱宝围绕“缘”的一场对话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谈到佛经中的缘字：

爱宝：“听我娘说，经里只有一个字。”

金九：“经里只有一个字？”

爱宝：“就是一个‘缘’字！”

金九：“是啊，你娘说出了博大精深的佛理。”

爱宝：“这个字，人人都有，但不是人人都看得见。”

金九：“是这样，不是每个人都看得见。”

爱宝：“不！我看见了！你也看见了！”

金九怔怔地望着爱宝那双乌亮的眼睛，

爱宝：“我跟你有缘！”

金九搂紧了她颤抖的肩膀，眼中的泪水在急速地汇集，他无限感慨地自语着：“缘啊·····缘·····国与国，乃缘；人与人，乃缘；心与心，乃缘·····一切皆缘，而一切皆无缘！这，就是金九至今还苦行在人间的缘故啊！”<sup>19)</sup>

对于缘份的理解，朱爱宝是直观的，朴素的。但金九却不然，他虽然早已被朱爱宝火热的心所打动，但他不能给朱爱宝一个正面的回答，这不仅是因为两人年龄的悬殊，更重要的是因为金九肩负着拯救祖国的重任，为了救国，他已经忍受了丧妻失子的痛苦，为此，他不忍再连累别的女人；在避难中他不仅要隐姓掩名，还要保护韩国的逃难同胞。所以他考虑的缘，不只是人与人的缘，还有国与国的缘；缘也不只是善缘，还有恶缘；国与国的缘也不只是韩国与中国，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中，可以说韩国与日本正是迫在眉睫的恶缘。金九考虑的缘在高度和深度上显然与朱爱宝不同。这里表现了金九做为一个人的心理，对于爱情的感激、踌躇、矛盾和苦恼。“一切皆缘，而一切皆无缘！”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哲理，暗示了一切缘分聚散的必然性，也暗示了他们两人的爱的悲壮结局。

朱爱宝在《漂在水上的日记》中写到：

他认了这份缘。

他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来，他心里有我。

我发誓，要为他摇一辈子的船！

他笑了。可是，他含着眼泪，还摇着头。我勿晓得，这是什么意思。但

只要他能笑，我就满足了。<sup>20)</sup>

《船月》的作者让朱爱宝选择的的就是这样的爱。在《虎步流亡》中，作者夏辇生倾吐了她对朱爱宝的感佩，她说：“若不是金九先生在他的传记中写下了这些，恐怕已不会有人在时隔几十年之后再提到这个普通船娘的名字，朱爱宝——这个普通的嘉兴船娘，曾经以其淳朴忠厚的情怀，给了金九先生一个漂泊而又安全的‘家’！……这个无怨无悔的女人，选择的是无须表达的奉献。”<sup>21)</sup>我们从这一段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夏辇生在《船月》中让朱爱宝选择的正是“无须表达的奉献”，这样的奉献出自一颗赤诚的心，朱爱宝心中的金九从陌生的“他者”发展到值得奉献，值得爱的同缘人。朱爱宝的奉献与李奉昌、尹奉吉所作的奉献是同样可贵的，作者在李、尹的奉献的延长线上列入了朱爱宝的奉献。这样就将中韩两国人民的心系在一起了。

## (二)、奉献精神的尹奉吉

与金九的形象相辉映的还有两个人物，即李奉昌、尹奉吉。“韩流三部曲”中，这两位民族英雄自始至终贯穿其中。作者夏辇生在书写《船月》《虎步流亡》时，还没有涉足韩国，叙述空间主要是嘉兴一带，《回归天堂》却与这两篇作品不同，它的叙述空间的一半是韩国。为了书写这部作品，夏辇生有机会到韩国采访，她走访了尹奉吉的家乡礼山，采访了许多韩国友人。关于尹奉吉的史料很有限，只有金九的《屠倭实记》和尹奉吉的诗集《鸣榘》《玉唾》及几封家信遗言记述着尹奉吉23年的生命。正因为如此，韩国采访对夏辇生来说是一次体验和了解韩国文化、了解韩国独立英雄尹奉吉的实地经验，对她的韩国认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夏辇生将《回归天堂》的叙述形式定位为双向多层叙述架构。（「韩流三部曲的叙述定位」）双向，指中国作家与韩国义士的心灵对话。多层指三个层面，一是每一章前，作者用第一人称来叙述韩国采访的体验与感受；二是正文中作者以第三人称客观叙述故事情节与人物个性；三是正文中主人公以第一人称展现自己的内在感情。

尹奉吉是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向日本军举行的“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会场投炸弹，炸死炸伤日军多人的韩国民族英雄。历史上称之为“虹口公园炸案”。同年12月19日，尹奉吉在日本就义。对于《回归天堂》的作者来说，尹奉吉固然是一个异民族人物，但他的一生到处都与中国有着关联。出生在礼山的尹奉吉，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汉文、儒学，青年时代从老师那里得到“梅轩”的雅号。作者夏辇生很重视尹奉吉的汉学教养，她通过尹奉吉的嘴吐露出韩国与中国文化上的关联：

我常常在想，汉文是不是像村口那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因为它深扎于地底下的根须不断吸收着那种属于源头的营养，树枝上的叶子才会年复一年地舒展着它不尽的绿意？假如追根寻源的话，我们的韩文恐怕不像汉文那样根深蒂固，这种拼音文字只能是大树上那些靠叶脉去舒展绿意的叶片，(下略)<sup>22)</sup>

这一段感受并不意味着尹奉吉盲目崇拜汉学，而是表示他对汉韩文化渊源的开眼。作者在尹奉吉的思想成长史上重视了韩国民族英雄安重根和金九的影响，在第4章安排了安重根的故事。尹奉吉读了中国的古典，知道了孔子、孟子，但是他在思考“这些通明之理又能否救今日之韩国？”<sup>23)</sup>这时他听到安重根在哈尔滨炸死伊藤博文的故事，他“猛然醒悟：在我追寻理想目标的人生旅途上，安重根就是指引我前行永不迷航的灯塔！”<sup>24)</sup>安重根的故事拨亮了尹奉吉的眼睛，促使他立志要为韩国独立奉献自己的一切。“三·一独立运动”后，许多韩国独立运动家都流亡中国，在上海建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金九任警务局长。尹奉吉只身出走，到上海后就在金九的安排下参加了「爱国团」，准备具体的抗日行动。

作者夏辇生在《船月》和《虎步流亡》中对“虹口公园炸案”都作了描写，她对李奉昌、尹奉吉都非常重视，因为他们都是「爱国团」员，在金九的指挥下向日军作了不惜生命的反抗，而金九又为他们的英举发表声明，一身揽责，受到日军60大洋悬赏的通缉。即“东京炸案”、“虹口公园炸案”都是在金九一手指挥下遂成的。所以作者对李、尹二人的英举非常重视。韩流三部曲中夏辇生都强调了李奉昌、尹奉吉的共同点“奉”的意义。在《回归天堂》中她写道：

一个巧合，不能让人感怀成就大业者人格力量之伟大——那就是在尹奉吉和李奉昌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奉”字。其间，注有何等高尚的精神！一个连身家性命都可以奉献的人，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出来？<sup>25)</sup>

在正文中主人公以第一人称倾吐自己的生死观，他说：

我想，包括安重根、白贞基、李奉昌等所有为国舍身的人·····与生俱来地肩负着以日本侵略者为天敌的使命。因此、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在于完成这一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死，对于一个完成了使命的人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归宿。难怪，人们早有“视死如归”的说法。<sup>26)</sup>

尹奉吉的“奉献”精神就来自他的这样的生死观。他以自己的生命“换取独立运动的一线生机”<sup>27)</sup>所以在他就义的一刻，作者为他设下了将军峰崩爆的场面。将军峰是尹奉吉的家乡礼山岛中岛上的一座山峰，一直被尹家看做是坡平尹氏祖先文肃公尹将军的象征，这座山峰在尹奉吉被枪杀的那一刻突然崩爆了。

将军峰顶，如火山爆发，喷吐出一股浓烈的火焰。火焰，在盘旋中升腾，时如烈豹，时如巨蟒，最后变成一只全身透红的火鸟，站立于将军峰顶。几

乎同时，在大亮的天光之中，苍天在东方睁开了一只巨大的天眼。火鸟低下头来，最后看了一眼大地，然后，抖开它巨大无比的翅膀，飞入天眼深处……<sup>28)</sup>

这“全身透红的火鸟”象征着尹奉吉，如同Phoenix不死鸟，突破将军峰，回归天堂，获得永生。除了这样的象征性的描写外，夏羣生还引用了许多具体的文件来评价尹奉吉，首先是1932年“虹口公园炸案”后金九疾书的《屠倭实记》，金九这样写道：

吾韩华二同志其勿以日人之坚甲利兵为惧，东京、虹口两炸案既足破此扰忧，则以吾血肉以吾精诚奋勇直前，复何畏何惧哉？呜呼大势亟矣，使不幸中华而受制于日，则其所受之惨毒艰苦必十百于昔之满清，而其复兴之难亦必十百于辛亥之役，吾韩更有万劫不复之痛矣！故如吾韩计复韩国，必先救中华，为中华计复韩国亦以救中华。此鄙人所以喑口哀音，以望吾华韩两同志之共醒以期共命于战场也！<sup>29)</sup>

在此，金九以东京、虹口两炸案为例，揭示了列强不足畏，靠着不折不挠的奋斗，弱小民族一定能争得解放的可能性。他把李奉昌和尹奉吉的形象提高到不仅是韩国争取独立的英雄，而且还是唤起中国人民掀起，与韩国人民携手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榜样的高度。金九把韩国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中国视为同志。他的这几行文字意在呼吁中国人民觉醒，中韩二同志合力“救中华”、“复韩国”。作者夏羣生引用这几行文字的用意也正在此，她对金九的共鸣在于她和金九一样，没有把李、尹二人的行为限制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范围内，而是把他们扩展到中国，扩展到被侵略被殖民统治的弱小民族，既国际主义的范围去认识，去评价，关注中韩两国共同抗争的具体行动和具体的交流。我们在围绕金九与李、尹二人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对韩国独立运动者的认同与评介。

《大陆杂志》也赞扬尹奉吉的英勇从容道：

在人类向上意志的最高形式上，他是一位抱了亡国的惨痛而不愿终为亡国的惨痛所侵蚀的新英雄。<sup>30)</sup>

《时代公报》将尹奉吉与爱尔兰新芬党、安重根相并比。赞扬道：

此次尹奉吉图炸白川等，为宗邦复仇，大意凛然。宁做救国鬼，不为亡国奴！<sup>31)</sup>

天津《大公报》发表蒋介石的述怀：“中国100万大军不可，惟一韩国青年尹奉吉遂成。”<sup>32)</sup>《救国时报》在1936年刊登文章，将尹奉吉列为“沪战殉国烈士”。<sup>33)</sup>夏辇生列举这些文章的目的在于要强调尹奉吉不仅是与安重根比肩的韩国义士，也是“中国人民心中的民族英雄”<sup>34)</sup>《回归天堂》中不论是想像空间的描述，还是纪实空间的叙述，都反映出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奉献”精神具现尹奉吉英雄形象，以中韩共同抗日的意义认同韩国青年的英举。

#### 四，“韩流三部曲”中的跨文化书写——算命鸟与天堂鸟

夏辇生的韩流三部曲是描写韩国人的作品，其中就必然会有涉及到韩国文化、风俗习惯等的书写，即一种跨文化的书写。跨文化书写，我们可以通过作品中的想像空间的描述和纪实空间的叙述来探讨。在想像空间的描述中一个书写聚焦点就是对“鸟”的描述。这也是《船月》与《回归天堂》的一个共同的叙述特点，在每个作品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船月》第一章开首《漂在水中的日记》中就出现了一个算命鸟，又叫“尖嘴鸟”。这是一个算命先生的鸟，它为朱爱宝叼出了一张纸牌。这鸟被描写得很出奇：

小鸟转了转它的蓝眼珠子，对我笑笑。真的，不骗你，笑得很神秘。然后，从搁在一边的纸牌中衔出一张来递给我。<sup>35)</sup>

算命鸟只在第一章里出现了一次，但在小姑娘爱宝的心里却留下了一生难忘的记忆。算命鸟所起的作用就是要为朱爱宝日后与金九相逢结缘设下伏线，蒙上一层神秘的纱幕。作者用了拟人的手法描写这个算命鸟，给它涂上神秘的色彩。这样的描写方法在迄今的韩人题材小说中很少见。但在从事了20多年儿童文学创作的夏辇生，却是一个得心应手的事情。夏辇生是喜欢写鸟的，我们翻开她的童话作品，比如《七个太阳》<sup>36)</sup>中那五彩六色的“太阳鸟”，那是太阳的孩子，也是太阳的使者。还有七彩的长尾鸟。这些鸟都是作者想像出来的，他们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他们都来自太阳，来自光明，为地球上的人们带来欢喜、幸福。还有儿童科学幻想小说《着火的蓝月亮》<sup>37)</sup>中的“乖乖嘴”，它是主人公——一个喜欢孵蛋的“怪博士”孵出来的助手“红嘴八哥”。它帮助“怪博士”作各种孵化实验，最后和“怪博士”一起飞到“梦的歌”城去。

《船月》中的算命鸟无疑是基于作者的童话式想像而产生的。《漂在水上的日记》是一个虚拟的叙述空间，算命先生、算命鸟、印有船与月的纸牌，这些都是构成这个空间的重要因素，衬托出朱爱宝的命运。因为夏辇生作品中的鸟多是从地球外的世界飞来的使者，算命鸟的出现也就为《漂在水上的日记》带来了美

丽的意象、好奇的幻想、神秘的暗示。

用鸟、鸡等飞禽类算命是中国民间的一种占卜的方法，现在在大陆已很罕见了。但这种占卜方法仍存在于韩国，笔者今年访问釜山时，在龙头山公园里就遇见了“算命鸟”。叼纸牌的方法与《船月》中的算命鸟一样。可见《船月》的作者用这个即细小而又重要的描述对象巧妙地将中国和韩国的民间习俗连接在一起了。

《船月》中，除了算命鸟外还有“鹧鸪”，这“鹧鸪”很像韩国的“红爪鸟”。在第五章「脚印里开出的花朵」中，“红爪鸟”和鹧鸪连接了金九的回忆和朱爱宝的梦境。朱爱宝与金九有这样一段对话：

“我变成鸟，飞上山栗子树的时候，看见那些咧着嘴笑的栗子有黄的，蓝的，绿的，还有红的。对，有红的！”

“哈哈哈哈·····”金九开怀大笑。

“你笑什么？”爱宝歪着脑袋问。

“我笑你现在又变成鸟了！”

“又变成鸟了？”爱宝被说胡涂了。

“没错。”金九站起身，走向窗边，“一只美丽的鹧鸪！”<sup>38)</sup>

鹧鸪原本是地球上生存着的普通的鸟，但在《船月》中，作者把它写进梦境——一种虚拟的叙述空间中，把朱爱宝与金九的心灵拉到一起。金九母亲的梦是在《白凡逸志》中有记载的，但朱爱宝的梦却是作者的想像。两个梦境的相关处就是鹧鸪与红栗子。朱爱宝的叙述完全用了一种童话式描写法，表现了她在她所爱的男人面前的纯真可爱。金九又因为爱宝的梦与自己母亲的梦相近，对爱宝产生了亲近怜爱的感情，把眼前的爱宝比做美丽的鹧鸪。在这里鸟与梦构成了一个被净化的封闭的空间，此刻，朱爱宝与金九忘掉了身边的危险，沉浸在两个心灵的纯洁的交流之中。

夏辇生的“鸟”起的最重要作用是连接这个世界与那个世界、现实与超现实，象征灵魂的自由飞跃。又如热爱朱爱宝的哑巴子为了保护朱爱宝和金九，被日寇打死，在临死前他笑了。

哑巴子的笑声，不是从嘴里发出来的，而是从眼睛里飞出来的，像无数只驮着阳光的鸟，她能听到它们欢快的鸣叫。<sup>39)</sup>

这里的鸟有如童话小说《七个太阳》中的太阳鸟，是光明和欢乐的使者，它起的作用就是将哑巴子的死净化，提升到美丽的意境。

这个连接这个世界与那个世界，表示灵魂的自由飞跃的“鸟”的象征性在《回归天堂》中表示的更明显更重要。它贯穿了整个作品，代表了这部作品的描写特征。第一章开首作者这样写道：

在初访韩国的日子里，总有阵阵鸟鸣，时隐时现地跟着我。声音不很清晰，但却真切入耳，扣击心弦· · · · · ·是喜鹊吧？——我感觉，那鸟是白色的，羽翼间闪射着来自天堂的光芒。这种光芒，柔和着阳光的激情和月光的冷静，灿亮而绚丽· · · · · ·<sup>40)</sup>

这个像喜鹊但又不是喜鹊的“鸟”在《回归天堂》中出现了不下20次，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这只“鸟”以“来自天堂的鸟”的形象逐渐清晰、宏大起来。小说第三章「曾经放飞一只小鸟」中写尹奉吉小时候在山里拾到一只受伤的小鸟，他把小鸟带回了家。一天晚上他作了一个梦，梦见那小鸟的伤养好了，要飞回天空去。

小鸟低下头来寻找。

哦，它看见了我，朝我微微一笑。我还是头一回见到鸟儿的笑容，在眼中，在嘴边，在每一片抖擞着精神的羽毛上。那笑容被阳光照射得异常神秘。

我坚信那是一只来自天堂的鸟儿。在它自由飞翔的时候，我见到了它羽翼上五彩的霞光。<sup>41)</sup>

这里对鸟的描写与《船月》开首的“算命鸟”很相近，都用了拟人的手法，而且与夏辇生的儿童文学的书写手法相同，起着一种超越、升华、神秘化的作用。“天堂鸟”象征了不受任何力量压迫拘束的自由的精神。

“喜鹊”在中国是吉祥鸟，在韩国也同样是吉祥的象征，韩语叫它“卡祺”，据说早上如果听到“卡祺”的叫声，这一天就会有好运气。韩国还有一个关于新罗建国的神话，传说二千多年前一只船漂到韩国的庆州附近，船的周围有很多喜鹊飞翔鸣叫，海边的人们随着喜鹊的叫声发现了这只船，发现船上有一个柜子，打开看时，里边坐着一个容姿端正的男孩，这个男孩长大后就成了新罗的开国之王，叫脱解王。在《回归天堂》中也可以看到船与喜鹊的描写，第十五章中，尹奉吉乘船去上海，清早他看见一只鸟伫立在桅杆顶上。

衬在如火的朝霞里，我看不清那是只什么鸟。

只是感觉出那鸟是白色的，羽翼间闪射着来自天堂的光芒。这种光芒，柔和着阳光的激情和月光的冷静，灿亮而绚丽· · · · · ·<sup>42)</sup>

尹奉吉到上海是为了见金九，鸟出现在他的船上，就暗示着他的愿望即将实现。这只鸟与作品开首登场的鸟一样，像是喜鹊，但又不是。但在暗示吉兆的意义上，与喜鹊的含意一致。这只鸟在《回归天堂》中一直是尹奉吉向往、追求的目标。在他就义的时刻，他终于变成了那只鸟：

将军峰顶，如火山爆发，喷吐出一股浓烈的火焰。火焰，在盘旋中升腾，时如烈豹，时如巨蟒，最后变成一只全身透红的火鸟，站立于将军峰顶。几乎同时，在大亮的天光之中，苍天在东方睁开了一只巨大的天眼。火鸟低下头来，最后看了一眼大地，然后，抖开它巨大无比的翅膀，飞入天眼深处……<sup>43)</sup>

尹奉吉以“火鸟”——不死鸟——的形象回归天堂。作品在结尾处描写了战后金九派人到日本寻回尹奉吉的遗骨，安葬在汉城孝昌公园，此时空中呈现出异样的光景：

一只又一只天堂鸟，从这飞溅的光芒中跳跃而出，在孝昌公园的上空久久盘旋！那鸟是白色的。羽翼间闪射着来自天堂的光芒！这种光芒，柔和着阳光的激情和月光的冷静，灿亮，纯净而绚丽！！<sup>44)</sup>

结尾的这一段描写完全呼应了作品开首描写喜鹊与来自天堂的鸟的部分，在这里好像是喜鹊的那只鸟，分明地以“天堂鸟”的形象出现，鲜明地表示了作者对这部作品的构思，即以“天堂鸟”作为一条引线，贯穿作品，这条引线由不太明晰的“喜鹊”的意象发展到鲜明的“天堂鸟”的象征，将尹奉吉的故事引向高潮，将尹奉吉的形象逐渐提高，逐渐鲜明化。也许因为这个写作意图，《回归天堂》在韩国出版时被改名为《天堂鸟》。如此看来，“算命鸟”也好，“喜鹊”也好，都是跨越中国和韩国的，它们在两国的民间风俗和文化中有着相关联的因素，它们能呼唤起中国和韩国读者的共感。因此，我们可以说《船月》《回归天堂》中鸟的意象是一种跨国、跨文化式的书写。

## 五，“韩流三部曲”的当今意义

中国的韩人题材小说，从五四时期到现今，贯穿其中的对韩认识的主流，始终是对韩国被殖民地化的同情和对韩国独立的希望。各个不同时代又加进中国人的时代感。如：从五四到建国时代，表现以韩半岛为反面或正面的镜子，忧国忧民，从而激励民心，奋起反抗；在朝鲜战争时代，则表现为援助朝鲜，保卫祖国



的国际主义精神。到20世纪末期，中国则通过了一个动荡的时代——文革时期，和转折的时代——改革开放时期，作家们的对韩认识也必然带上动荡和转折的色彩。另一方面，做为被认识的对象，韩半岛南北分断的现实也为中国作家提出了新的、复杂的课题。

夏羣生正是在文革的动荡中渡过了她的青年时代，她与她的家族经受的遭遇，在她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泯灭的伤痕。她对文革的反思、疑问，是付出了痛苦、流血、牺牲的代价的。但又正是这个文革的遭遇，使韩国做为一个“他者”出现在她的面前，给了她一个反顾历史的契机。在她那里，对韩国的认识跨越了大半个世纪，从文革时期的经历，接上90年代中韩建交，彼此来往的新时代，通过帮助金信寻访，才得到揭示30年代金九流亡中国的那一段历史的机缘。正象夏羣生在《虎步流亡》「后记」中说的那样：“很多时候，写书便是将这些昨天的故事浸泡在今天的水中，显现出历史的花纹来，迎候着明天太阳的照耀。”<sup>45)</sup>她的“韩流三部曲”正是将半个多世纪以前金九、李奉昌、尹奉吉的故事浸泡在今天的水中，浸泡在中韩两国人民的来往交流中，浸泡在作者的辛苦寻访和丰富着实的想像中，显示出来的历史的花纹。这个浸泡的过程正是作者接近韩国这个生疏的“他者”，由生疏到熟悉的过程。作者主体性地、意识地进入了历史、摸索到了历史的脉搏。

夏羣生对韩认识的基点是金九、李奉昌“东京炸案”和尹奉吉“虹口公园炸案”。三部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对这两个事件的描写，对李奉昌、尹奉吉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反映了作者对他们以身许国，为民族独立不怕牺牲的精神和行为的感动。作者的感动分散在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言行上，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来。与五四时期的韩人题材作品相比，夏羣生的“韩流三部曲”明显地实现了一次大幅度的深化。其意义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五四时期的作品虽已有对韩半岛的负面或正面的认识，但着重强调的多是亡国的悲哀；小说的主人公也多以中国人为主，通过中国人的叙述描写朝鲜人的形象。相对而言，夏羣生的“韩流三部曲”则均以韩国人为主要的、直接的描写对象，正面对待韩国，注重韩国人民的反抗，全面强调韩国做为中国的正面镜子的意义。

第二，如果说五四时期的作品多以传闻、报刊为描写韩半岛的题材来源，表现中国人的同情和自省。那么“韩流三部曲”的作者夏羣生则对这段历史作了直接的、全面的调查。她查阅了《白凡逸志》《屠倭实记》等历史资料；与金九的儿子金信及许多韩国人士共同调查；亲访韩国，作了实地采访和调查。历经十年的调查，使作者掌握了充分的写作资料，挖掘了至今未被知晓的史实。她的“韩流三部曲”就是基于这些丰富的资料写就的。以中韩两国人民共同抗日、生死以共的历史故事为题材，表现了两国人民志同道合，“血浓于水”的情谊。表示着中国人不再是韩国的敌人和旁观者，而是他们的同志。

第三，“韩流三部曲”以作者对历史的主体性的迫近，突破了对韩认识的禁区，勾通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与韩国之间的隔绝，为我们揭开了长期以来被忘却和被扭曲的历史。作品中呈现出的对韩认识，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澄清了长期以来中国对南韩的误解和疑惑，为我们展开了重新认识中韩关系的视野。

第四，在“他者”形象描述中始终贯穿了作者对韩国文化的关心、认同，为韩人题材小说拓展了新的视野。在叙述方面，作者以她所擅长的儿童文学的手法，扩大了历史小说的叙述空间，提示了新的叙述的可能性。

第五，在消费经济膨胀，拜金主义价值观泛蓝之际，人们的心灵世界正面临空虚，颓废的危机。而夏辇生的作品却恰恰赞颂了中韩两国人民置利益甚至生命于不顾，发自内心的、不能用任何物质价值去衡量的友谊、具有警惕和填补人们精神空白的意义。

在20世纪与21世纪相接交的时刻，夏辇生以她的“韩流三部曲”表现出对韩认识与对韩感情的深度，呈现了跨民族文化认同的幅度和深度。在当今韩流席卷亚洲之际、在跨文化交流的时代潮流中，夏辇生为我们掀起了另一股来自中国的韩流，填补了中韩两国被忘记的历史。

#### 参考文献

- |     |          |           |       |
|-----|----------|-----------|-------|
| 夏辇生 | 《船月》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99年 |
| 夏辇生 | 《虎步流亡》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99年 |
| 夏辇生 | 《回归天堂》   | 上海文汇出版社   | 2002年 |
| 夏辇生 | 《着火的蓝月亮》 | 少年儿童出版社   | 1999年 |
| 夏辇生 | 《七个太阳》   |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1999年 |

|  |                                   |       |
|--|-----------------------------------|-------|
| 夏羣生 《蓝色钟声的诱惑》  |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 1992年 |
| 夏羣生 《蓝巴掌》  |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 1992年 |
| 金九 《白凡逸志》  | 平凡社                               | 1975年 |
| 金九 《屠倭实记》  | 《白凡金九全集》所收                        | 1999年 |
| 朝鲜史研究会 《朝鲜的历史》                                       | 三省堂                               | 1988年 |
| 孙忠武 《暗杀》   | 晴文社                               | 1972年 |
| 《PLUTARCH' LIVES》                                    | Plutarch HARVARD UNIVERSLTY PRESS | 1967年 |
| Donald Spence 《Narrative Truth and Historical Truth》 | W • W • Norton and Co             | 1982年 |
| E • H • Carr 《历史是什么》                                 | 清水几太郎译 岩波新书                       | 1999年 |
| 赵白生 《传记文学理论》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3年 |
| 尾崎秀树 《历史文学论》   | 劲草书房                              | 1976年 |